



李银河 / 主编

钱理群 著

示众



重庆出版社

示众

钱理群 /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示众 / 钱理群 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3.9
(知识分子丛书 / 李银河主编)

ISBN 978-7-229-06848-6

I. ①示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86166号

示众

SHI ZHONG

钱理群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廖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陈建军

责任编辑: 徐宪江

营销编辑: 高帆

责任印制: 杨宁

封面设计: 尚燕平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st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6.625 字数: 120千

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编者的话

在“乱书渐欲迷人眼”的当下，我们出版人最大的期待就是读者能够向理性阅读回归——同时我们深知，出版人有义务引领这种回归。基于此，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李银河老师主编的《知识分子丛书》。该丛书的作者们是活跃在当代中国知识界、思想界的著名知识分子，他们各自精选十余万字超出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，关注社会、关注思想、关注人生的优秀作品奉献给读者朋友。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，作品风格各异，有散文、有随笔、有杂文、有回忆录，或向读者传递他们的知识，或向读者展示他们的思想，或向读者讲述他们的生命体悟，从不同的方面给我们启迪。当然，这些文字是作者们对自己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私人记录，其中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，并不“代表”谁，对读者而言亦是见仁见智之事。

让图书成为人的精神家园和智慧源泉，让高品质的阅读成为人的精神享受与生活方式，这是我们一贯的出版主张。我们相信

这套书是奉献给读者的精神盛宴；希望籍由这套书，让知识分子阶层的阅读成为一种风气，让这种阅读提升我们的人文素养与精神境界。

李银河老师为组织、选编本丛书多方奔走，耗费心力甚巨，在此谨致敬意；王水博士、郑红霞老师为本丛书的策划、选编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工作，至为感谢！

知识分子丛书总序

知识分子应如何定义？有人说知识分子是一个职业；有人说知识分子是一种身份；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追求真理的人；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批判社会的人。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。在所有这些定义中，我最喜欢法国大知识分子雷吉斯·德布雷的定义。据他说：“知识分子需要投入、表态、传播，这和作家不同，作家只是满足于写小说或诗歌；与艺术家也不同，艺术家需要创造艺术作品；和学者也不同，学者寻求的是真理。而知识分子就是一种干预性的态度，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和实验室。比如雨果，当他写《世纪传奇》时，他是作家，但当他写《死囚末日记》时，就是一个知识分子。因为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在法国取消死刑，或者是写拿破仑三世的时候，就是为了打倒拿破仑三世的专制制度。还有画家库尔贝，当他画《奥尔南的葬礼》的时候，他是一位画家；但是当他加入巴黎公社，主持讨论摧毁拿

破仑树立起来的旺多姆圆柱的时候，他就是知识分子，当然他也为此入狱。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，科学界的约里奥·居里或者是萨哈洛夫，当他们为核工业能源工作的时候，他们是科学家，但是当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时候，或者是主张维护人权的时候，就是知识分子。萨特在出版《词语》的时候是一位作家，但当他主持罗素法庭批判美国入侵越南的时候，他就成为一位知识分子。”

这套丛书取名知识分子丛书，就是在德布雷意义上取的。这套书的作者都有各自的专业，但是在这套丛书中，他们都写了一些超出自己专业之外的文字，在公共事务上发言，批判社会，关注与社会的发展有关的议题。我编这个丛书有两个遴选标准：第一，要有思想。第二，文字要好。

为了这两个标准，我大费周章。如果论文字好，首选王小波、李零和冯唐。他们的文字都是我最喜欢的。借用冯唐评价文字好坏的标准，这三个人的文章我看的时候都曾大笑。在我京郊的住所，我读李零的文章笑倒在榻榻米上。冯唐的文章也曾大笑多次，差点诱发哮喘。小波的当然早就笑过。还有崔卫平佐证，她对我说，读小波的东西不能在地铁这样的地方，因为你一旦大笑，别人会以为你发了神经病，所以她说，她是和十几岁的女儿一起坐在家里床上看的，看着看着就笑倒在床上。

我相信，这里选的知识分子作家都是中国当代最好的写作者。他们敏锐的思想、独到的视角和美好的文字是我国文坛的最佳收获，也是当代汉语写作中的最高境界。我请他们每个人自己选出自己最得意的文章，每人十万字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我估计十万字是人们耐心的极限，请不要让我后悔应当把每本字数定在八万。可以放心的是，这些作者都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：他们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，更不是逼出来的（没的写硬写），而是“流”出来的。因为心里太满，冲动太强，所以不得不“流”出来的。相信读者会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作者写作时内心的快乐，这将是一位读者所能祈望得到的极致。

可惜的是，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，这套丛书最终无法收入李零、秦晖、吴思、葛剑雄等人的文字，遗憾之至。

李银河

2012年9月30日

目录

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/ 001

漫说“鲁迅‘五四’” / 001

“鲁迅左翼”传统 / 013

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/ 052

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 / 075

“攫人心”的文学 / 087

寻找失去的“大学精神” / 105

直面中学教育的深层次问题 / 130

一百块钱，有多轻又有多重？ / 148

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 / 161

寻求中国乡村建设与改造之路 / 167

我的告别词 / 176

示众 / 193

后记 / 200

漫说“鲁迅‘五四’”

——2009年3月11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“国家历史”讲堂上的演讲

今年是“五四”九十周年，从年初起就接到不少作讲座的邀请。“五四”在我的专业范围内，似乎没有理由不讲。但退休后我已经远离专业，很少做这方面的研究。没有新研究，却偏要讲，这就是我今天到这里来演讲的尴尬处。为此我苦恼了好几天，直到昨天非要作准备的时候，才想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：讲讲我的老观点在今天思想、文化状态下的新意义，就算是“老话新讲”，而且限定在我最熟悉的范围：讲鲁迅。于是，就有了今天的讲题：“漫说鲁迅‘五四’”。

先来释题：怎么叫“鲁迅‘五四’”？我的这个命题是从汪晖在十年前写的《中国现代历史中的“五四”启蒙运动》一文提出的一个观点引申出来的。他认为，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显著的特征，就是这个运动的发动者、参与者仅仅拥有“态度的同一

性”，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与怀疑态度。胡适、周作人都说过这样的话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观念是“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”，大家是团结在这一口号、旗帜下的。当然，也还有“启蒙”、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这样一些被今人认为是“五四精神”的共同价值理想。但如果再追问下去：以什么标准来“重新估定价值”，要坚持怎样的“科学观”、“民主观”、“启蒙观”？——彼此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。这就是说，在某些大体的，具有某种模糊性的共同价值观念之下，每一个在当时有影响的发动者、参与者，都以各自不同的理解、追求与实践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上打下个人的烙印，甚至形成某种传统。于是，在总体的“五四”之下，有陈独秀、李大钊的“五四”——那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“五四”；有“胡适的‘五四’”——那是走向自由主义的“五四”；当然，也就有鲁迅的“五四”。还有蔡元培的“五四”——我最近在研究沈从文，就注意到，沈从文在六十年前，也就是上一世纪的四十年代写了好几篇文章谈五四传统，谈的就是蔡元培的“美育代替宗教”的传统，希望通过文学的复兴来重建信仰，再造中国。这些年围绕着“五四”传统（与之相关联的还有所谓“北大传统”）有许多争论，或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，或强调自由主义的传统，其实都是“五四”传统在某一方面的发展，以李大钊、陈独秀的“五四”，或胡适的

“五四”来代表、概括“五四”传统，而且把他们相互对立起来，这背后有一个“争正统，建法统”的意图和心态，但却都在不同程度上使“五四”传统狭窄化与简单化。以此来观照今天的有关“五四”的言说，就可以发现，其实，人们都是在谈各自心目中的“五四”，或者说，是从各自的价值立场、理想来谈“五四”的，有的人是在说李大钊、陈独秀的“五四”，有的则是在说胡适的“五四”，这是不能不作细致的分辨的。

因此，我今天来谈“五四”，就先要向诸位交代清楚：我谈的是“鲁迅‘五四’”。我更要强调的是，鲁迅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上打下的个人印记，从而形成的鲁迅传统，这是“五四”大传统下的小传统。就是说，鲁迅传统在基本方向上和“五四”传统是一致的，是其有机组成部分，它和其他人的“五四”不是对立，而是相互补充和制约的；鲁迅的贡献是独立而重要的，但绝不是唯一的，尤其不能以“鲁迅‘五四’”来代表整个“五四”传统。——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，并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，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有一个说法，直到今天还很有影响，就是“鲁迅是‘五四’新文化运动的主将”，“鲁迅的方向就是‘五四’新文化运动的方向”：而这恰恰是应该质疑的。

首先，鲁迅自己就不承认。他在《〈自选集〉自序》里说他

是“尊奉”“五四”文学革命的“前驱者的命令”而写作，并自觉“和前驱者取同一步调”的：“遵命”这一说法本身就否定了“主将”之说。鲁迅自己明确地说过，“五四”文学革命是胡适“提倡”的（见《无声的中国》）。如果说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有“主将”的话，那就是陈独秀：这大概是这些年学术界的一个共识。陈独秀在鲁迅逝世以后，写了一篇《我对鲁迅的认识》，有这样一个回忆：“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，都是《新青年》作者之一人，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，发表的文章也很多，尤其是启明先生；然而他们两位，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，不是因为附和《新青年》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，所以他们的作品在《新青年》中特别有价值”。——“不是最主要的”，当然不是“主将”；但有“自己的独立思想”，因而“特别有价值”：应该说，这是一个客观的、准确的评价。

那么，鲁迅的独立和独特价值在哪里呢？这首先表现在他对“五四”启蒙主义话语和实践的复杂态度。鲁迅在谈到“我怎么做起小说来”时，明确地说，他的写作坚持的就是“五四”启蒙主义。但他在同学们在高中就读过的《〈呐喊〉自序》里，谈到当年“金心异”，也就是钱玄同劝他加入《新青年》时，他又对启蒙主义提出了两个质疑：一个是“铁屋子”单凭思想的批判就能够“破毁”吗？再一个是你们把“熟睡的人们”唤醒了，能给

他们指明出路吗？因此，在“五四”运动一周年，即1920年5月4日那一天，他在给自己的学生写的一封信里，对学生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“学界纷扰”，出乎意料地给予了冷峻的低调评价：“由仆观之，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，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。”到后来大革命失败了，目睹年轻人的血，鲁迅更是痛苦地自责自己的启蒙写作，只是“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，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，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，得到格外的享乐”，鲁迅甚至怀疑自己不过是充当了“吃人的筵宴”上“醉虾的帮手”。但他最后的选择，还是从“淡淡的血痕”中“看见一点东西，誊在纸片上”。——在坚持中质疑，又在质疑中坚持：这样的启蒙主义立场，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以至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，都是非常特别而独到的。

他不仅对“五四”启蒙主义采取了这样的“既坚持又质疑”的复杂态度，而且对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核心观念——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，也有复杂的分析。早在上一世纪初在日本留学时，他就指出，西方科学思潮和英、美、法国革命的民主观念，传入东方国家，必然引起思想与社会的巨大变革，对于摆脱东方专制主义产生积极影响。但他同时又指出，如果以“科学为宗教”，就会产生新的弊病：“盖使举世惟知识之

崇，人生必大归于枯寂，如是既久，则美上之感情漓，明敏之思想失，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”。而如果将“民主”推向极端，变成“众数”崇拜，就会变成“托言众治，压制乃尤烈于暴君”，导致历史的循环：“以独制众者古”，“以众虐独者今”。可以看出，鲁迅对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这类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观念也是既坚持又质疑的。

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鲜明，而多少有些犹豫不决的复杂态度？这就需要了解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双重困境：一方面，他们面对的是政治与思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，要对其进行“价值重估”，就必须引入西方的科学、民主、启蒙观念；另一方面，从世界范围看，西方社会里工业文明的许多弊端已经暴露，科学、民主、启蒙这些观念开始受到了质疑。用鲁迅的说法，封建专制主义是“本体自发之偏枯”，西方文明病是“以交通传来的新疫”，正是这“二患”使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陷入了双重疑惧和忧患之中。由此导致的是四种不同的选择：一是坚持首先全面引入西方文明，即所谓“全盘西化”，以期彻底解决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，以后再来处理西方文明的弊病问题——这大概就是胡适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路；二是因为看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，就转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，以期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中国与世界——这大概就是“五四”时的文化保守主义

者，以及以后的新儒家的思路；三是引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，以期达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，避免资本主义的双重目的——这大概就是李大钊、陈独秀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路（晚年陈独秀的思想有变化，应另作讨论）。应该说作出以上选择的知识分子，都是旗帜鲜明，立场坚定，充满自信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的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他们的选择，是能够解决困境，避免偏颇的救世良方，是通向真理的理想之路。而鲁迅却恰恰没有这样的自信，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是坚定的，但他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观念（例如科学、民主）的态度却是“既坚持又质疑，既吸收又批判”，他说自己要找的是一条“似乎可走的路”，并不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和理想化，他更不试图去寻找一条毫无矛盾和缺陷、全面而完美的、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问题的理想之路。他正视矛盾，不回避选择的困惑，始终在矛盾的张力中，在充满怀疑与绝望中，坚持探索、追寻。但他的选择又不是折中主义的，他并不回避自己的“偏至”：尽管存有质疑，但他依然积极参与“五四”启蒙运动，坚持科学与民主，也就是他所说的始终和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保持步调的一致，这也是时代的要求使然：在鲁迅的时代，封建专制主义是主要的危险；西方文明病，就全局而言，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危机。

这就说到了我们这个时代，既和鲁迅的时代存在着历史的连

续性，又有巨大的不同：我们今天既面临着并未退出历史，并具有时代新特色的东方专制主义，同时，又要面对日趋严重的西方工业文明病，也即现代文明病。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经典概括：“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：自油松片以至电灯，自独轮车以至飞机，自镖枪以至机关炮，自不许‘妄谈法理’以至护法，自‘食肉寝皮’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，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替宗教，都摩肩挨背的存在”（《随感录。五十四》）。——在我看来，这也是当下中国的现实：我们正是一个“前现代”、“现代”、“后现代”都“摩肩挨背的存在”，“缩在一时”的社会。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思想、文化、学术界所要面对的，也必然是把几个时代的问题“缩在一时”的充满悖论与混乱的状态。就今天我们讨论的“五四”传统问题而言，我们就有相互矛盾的两方面的任务：面对“前现代”的专制主义，我们必须坚持“五四”科学、民主、启蒙传统；而面对“现代”文明病，我们又需要质疑科学、民主、启蒙。由于我们必须有坚守，又要对消解性的“后现代”的质疑进行再质疑，这样，“鲁迅‘五四’”，鲁迅式的“既坚守又质疑”的复杂态度，特别是鲁迅式的在肯定的同时进行质疑，又在质疑的同时作出肯定，在质疑与肯定的不断往返中深化自己的思想的思维方式，以及他的既反对专制主义，又批判现代文明